

反社会主义还是反国家崇拜？

何春蕤

——也谈欧威尔的《一九八四》

一般人在谈欧威尔的名著《一九八四》时，常把欧威尔描绘成他是「反共」的。

当然，乍读欧威尔的《一九八四》，受到冷战心态影响的读者立刻联想到他笔下的世界是以苏联的共产政权为蓝本，比较熟悉欧威尔的读者则也会联想到欧威尔是在表达他对一九四〇年代英国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的失望。由这两个线索，一般的结论是：《一九八四》是反社会主义的。

可是这个结论也许下得太快太简单了。

让我们先看看作者欧威尔个人的经历，或许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九八四》这本书。欧威尔曾担任过英国工党左派报纸的文学编辑，一九三七年他曾加入西班牙左翼民团对抗独裁者法朗哥的战事。对欧威尔来说，对抗法西斯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是一体的两面，所以他才亲身加入西班牙内战。

那么欧威尔是否和其他三〇年代的社会主义者一样，在四〇年代改变了原先的立场，不再相信社会主义了呢？

我们至少可以找到两个证据，证明欧威尔并没有放弃他的社会主义立场——他反对的是苏联极权式的共产主义，但是他个人的社会主义立场则没有改变。第一个证据是：三〇年代改变社会主义立场

的人认为完全的平等是不可能的，那只是政客和独裁者欺骗民众的把戏。欧威尔则仍对平等抱着希望；他借着《一九八四》中所谓反对极权势力的宣传手册提到，现代工业的蓬勃，已带来了经济平等的可能性，原来的阶级社会因此有解体的可能。第二个证据是：欧威尔仍然抱着希望，等待下层阶级来实现社会主义，在《一九八四》中他不断地重复：「如果有希望，这希望是在普罗阶级身上的。」只有下层群众才能击败「党」的极权统治。

另外，欧威尔的描述不但适用在苏联共产政权上，连西方工业超级强国也在他的攻击范围之内。举例来说：《一九八四》中所描绘的「真理」，事实上是一种极端的实用主义；真理是用来服务党的需要。而在现代西方工业国家中，真理也变成了「多变的真理」，可随时因大企业的需要而改变，因主流的利益而改变；「真理」是由「大多数」的「同意」而决定的，主流媒体所呈现的「共识」变成了真理，少数的声音则总是异端、不爱国的共党奸细。

再举个例来说，《一九八四》一书详细地说明了「双重思考」（或「两面思考」）的特性：人在脑中同时持有两个互相矛盾的概念。一般人都认为只有苏共或中共才如此思考，殊不知在西方国家，人们也常做「双重思考」：当他们说「自由世界」时，往往是指反共的国家，而不管那些国家是否真的有政治自由；他们说「保障自由」时，往往只是剥夺其他国家或民族的自由，而促进本身的经济利益（赚钱的自由）而已；他们说，应该多制造核子武器，以遏止核战，维持和平，那就更像欧威尔书中的口号「战争就是和平」了。

同样的，我们不也在自己的社会中看到同样的「双重思考」吗？像讲到「主权在民」时，贡寮的

人就没有权利决定核四，讲到「生命共同体」，绝不会是指同性恋与异性恋的生命共同体！

欧威尔虽然不反对社会主义，但是他却反对国家崇拜。在国家崇拜中，国家的命运被当作最高利益，各种人民的实践或抗争则被收编为国家的打造工程。

这种以国家为崇拜对象的倾向并非现代才有，十六世纪马基维利在他的《王侯论》及《讨论集》（特别是后者）中，便已系统而冷酷地描绘维持国家存在及国家利益的权谋艺术。他所谓的「国家」虽是以君王为具体体现，但是在考量维系君王的治权时，他的立论却清楚的建立在「国家是崇高无上的」假设之上。

马基维利之所以把人生存的目的及意义投射在人以外的国家身上，当然有其历史原因。文艺复兴时对人性和教育的乐观看法，到了十五世纪末期已逐渐丧失吸引力，义大利本身现实状况的苦闷粉碎了这种一厢情愿式的理想主义，连年不断的内战与外国势力入侵，更使得当时的人对上一代的乐观人文精神感到失望。在义大利由中世纪开始的四百年权术传统之下，马基维利清晰地提出另一条出路，寄望由专制带来和平与统一，由国家的权力集中而带来力量与繁荣。历史证明，他的理想在无意中种下了现代国家崇拜的种子。

欧威尔以《一九八四》总结了马基维利之后另外四百年的权术传统。他笔下的国家崇拜更加非人化，更加冷酷。关于这点，只要读过《一九八四》的人均可领会，毋庸我多说。

现在常有人说台湾已经从权威性领导过渡到民主化阶段，并且朝向完全的民主社会政治文化进行。可是在我看来，就欧威尔所关切的国家崇拜，台湾不但没有什么改变，而且变得更严重又更巧

妙。自从蒋氏迁台后所开始的爱国主义或国族主义传统，以及各种打造国家机器的工程（例如，为塑造国族而推行的国语运动、以及民意调查式的代议制选举）均仍健在。不同的是，以前靠的是压制，现在则借着威权式民粹主义，求得被统治者的拥戴或积极同意（active consent）。

换言之，新的国家打造工程技术变得更细致巧妙了。例如，为了适应旧强人瓦解后的权力集中问题，代表「全民」的正当性，要以直接诉求全民的选举技术来呈现；另外，包括国会等民意机关在内的统治机器也开始了简化、合理化、单一化的趋向，以求有效的、迅速回应的统治；在这种统治方式下，逃脱国家的社会空间缩小了，国家机器无所不在，激进或彻底的抗争会变得较为困难。

如果我们把欧威尔的《一九八四》放在乌托邦文学的传统中，《一九八四》所描写的总是个幻想的世界；可是，当我们把《一九八四》放在国家崇拜的传统中来看时，这个幻想的世界就变成我们周围的现实世界了。

